

余嘉锡致胡适二札考释

安学勇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收入余嘉锡致胡适书信四封^①,皆为原手迹。其中两封已经被加以标点,收入《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②。尚未整理的另外两封书信亦十分重要,今谨予以录写其文,添加标点,并结合有关史料,判定信件写成年代,且对书信中涉及到的具体学术事件略作考释。

—

适之先生赐鉴:

日昨趋聆麀教,不胜忻快。承许为辅仁诸生演讲,尤为感荷。顷与陈、沈两君相商,其时间即定为一月六日下午二时以后。届时锡当在校中拱候,至于题目,亦请随意拟定,锡等不敢代大匠斲也。

尊著《〈真诰〉考》已伏读一过,此书锡曾读之至再。乃于叙录中之顾玄平不甚注意,不知其即顾欢。于此益叹平日读书粗心,不及先生精密远甚。昔人读此书者,大抵猎其膏腴资词章耳,即锡亦不过采其故事,以备考证。(篇末驳正《提要》处,酌采入拙著,当引用原文,不敢掠美,敬以奉白——又及)^③其藉此以探道教秘密者,自先生始,即以此篇为此学开山可也。讽味之余,无任倾服。锡向谓此书与《枕中记》及《位业真灵图》关系颇深,不识先生以为如何?归后检得绍兴时人所书《四十二章经》,著录于《金石萃编》百四十九,但其书于佛道经,例不录本文,其碑现在杭州,则拓本当不难得也。匆布。敬颂

著安!

余嘉锡启 十二月十九日

此信未署年,只署“十二月十九日”。开篇提及胡适承许为辅仁诸生演讲,

①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182-195页。

②杜春和、韩荣芳、耿来金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40-643页。

③注:信件原文为小字,今加以括号。

并定时间为下年1月6日。查《胡适日记》1934年1月4日载：“余季豫先生（嘉锡）来谈”。又1月11日载：“下午到辅仁大学讲演‘考证学方法的来历’”。^①余嘉锡为何拜访胡适，日记未详言，当是与胡适赴辅仁演讲事情有关。原本计划演讲日期为1934年1月6日，经商议后推迟至1月11日。故判定此信写于1933年12月19日。

信中提及的“陈、沈两君”，为陈垣与沈兼士。陈垣时任辅仁大学校长，沈兼士为辅仁大学文学学院院长，余嘉锡为国文系主任。

信中言演讲题目由胡适“随意拟定”，据前文所引《胡适日记》可知，此次演讲题目为“考证学方法的来历”。胡适之所以会选定这个题目，当与陈垣有一定的关系。陈垣认为清代朴学方法受到了西洋耶稣会士的影响，并曾与胡适讨论过此事，1933年12月30日《胡适日记》记载：“陈援庵先生来谈，谈了两个多钟头……我们谈‘清代朴学方法的来历’。他似乎不很信西洋耶稣会士与清代治学方法无关。”^②12天后的1934年1月11日，胡适即于辅仁演讲“考证学方法的来历”，与陈垣观点针锋相对，胡适同天《日记》载：“近年学者往往误信清朝汉学考证之方法是受了耶稣会教士带来西洋科学的影响。此说毫无根据，故作此讲演，证明朴学方法确是道地国货，并非舶来货品。”^③胡适所谓“近年学者”，当包含陈垣，其在陈垣掌校的辅仁讲此内容，明显是有意针对陈垣。胡适此次演讲内容后经整理，以《考证学方法之来历》为题目，载于1934年1月12日至13日北平《华北日报》。胡适认为考证方法出于中国传统的刑名之学，“‘审问’官司，实在与考证的方法无分别。”^④早在1928年，胡适便已经将司法求证与考据方法联系在一起，曾言：“司法上的求证，侦探的探案，与考证之学同一精神，同一方法。故我常疑心中国的考证学出于刑名之学。清代的考证学大家，出任民事时，往往善于断狱，袁枚、崔述、孙星衍、汪辉祖等皆是其例。”^⑤

信中所言《〈真诰〉考》，指胡适《陶弘景的〈真诰〉考》一文。该文作于1933年3月29日，4月9日改定，载于1935年1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生日论文集》（下），又收入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2。胡适认为，《真诰》是陶弘景为传经而作，“（陶弘景）有心要把一大堆鬼话编成一部道教传经始末的要典”。陶氏著作动机即有欺诈性质，书中内容更是有意作伪，如佛教典籍《四十二章经》中，“有二十章整个儿的被偷到《真诰》里来了！”最后，胡适大胆结论：“其实整部

①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6、280页。

②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267页。

③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280页。

④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第284页。

⑤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第18页。

《道藏》本来就是完全贼赃。”^①对道教学说整体加以否定^②。余嘉锡所谓“藉此以探道教秘密者”，当即指此而言。胡适“整理国故”以“打鬼”“捉妖”为目的，用胡适的话说，即“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③

余嘉锡认为《真诰》与《枕中记》及《位业真灵图》关系颇深，《四库提要辨证》云：“《宋史·艺文志》神仙类有《上真众仙记》一卷，与《通志》所列之《元始上真记》一无元始字，一无众仙字，似即一书。疑《元始上真众仙记》其本名，《宋史》、《通志》皆从其省名耳。然则《提要》以《通志》无众仙字，遂断其非此书者，非确证也。”《四库全书总目》言《枕中记》“书中说多谬悠……诞妄尤甚”。余嘉锡将《真诰》与之相比较，认为“是道家相传，原有此悠谬之谈”。《位业真灵图》，即《真灵位业图》。《四库提要辨证》云：“《真诰》与此书，同一荒唐之言，未见《真诰》果出此书之上也。弘景肯作《真诰》，未必不可作此书。《道藏》尊字号《陶隐居集》载有此书之序，相其文词，实出六朝人之笔，非出伪托。”另外，余嘉锡还发现《真灵位业图》中亦有与《真诰》相矛盾，而与《枕中书》相合之处。最后，余嘉锡认为：“道家者流，援儒入墨，以张其教，存而不论可矣。”^④

二

适之先生阁下：

昨者畅聆教益，欣抃莫名，归后竭半日之力，将大著及《独立评论》细读一过。窃见自汉至唐数百年之思想极盘错纷纠之致，自来无一书能言之成条理者，大著钩玄提要，如数指上罗纹之而无不深中肯綮，真所谓率语皆精、浅语亦好。其六祖以下之禅宗，锡从来读其书莫名其妙，今乃得了然心目，获益非浅。快读之余，不觉颔首至地矣。周刊中皆崇论阔议，发人深省，即以文字论，亦多数足当“雋永”二字。

《〈伪书考〉补证》亦阅之终卷，驳杂之处、穿凿之说所不能免，而其大弊在不通考证之方法。夫姚氏书之不满人意者，为其聚敛无数之空言，毫无实据也。今为之作补证，又引钱谦益、方苞、姚鼐、汪绂、王昶、杨椿、吴敏树、吴汝纶之说，以附益之。此辈原不懂考证，充其技亦只能使之乎者也位置妥帖耳。其是非亦何足深论，而以取充篇幅乎！又好取古书相比较，摘

①胡适：《陶弘景的〈真诰〉考》，《胡适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6、177、186页。

②对于胡适“整部《道藏》本来就是完全贼赃”的结论，近来学者多有驳斥，参见殷诚安：《贞白先生本清白——试论胡适〈陶弘景的《真诰》考〉及〈真诰〉与〈四十二章经〉的关系》，《中国道教》2002年03期。

③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胡适全集》（第3卷），第147页。

④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1223页。

其某字某句见于某书,即为剽窃之证,不知其据何科条、有何限断,此盖近人流行之通病,日昨尊论已畅言之矣。以此观之,黄氏之书虽考索甚勤,要不过三四等文字耳。其“刘子新论”条下,于鄙说不引其前后考证,而独断章取义,摘出数语以驳之,究之同属空言。鄙说未必非,黄说亦未必是也。质之宗匠,以为然否?

拙著务希痛加绳纠,如有新材料亦望不吝示。完稿时当具载大名,不敢掠美也。《补证》一册附缴奉。此致

春^①安!

余嘉锡谨启 一月十八日

按,1932年5月22日《独立评论》创刊,1937年7月8日胡适离开北平,9月赴美国作非正式的外交工作。此信属日期为“一月十八日”,则当作于1933年1月18日至1937年1月18日之间。而1935年1月,胡适南游于香港、两广等地区。1936年1月10日,胡适从北平登车南下,1月14日出席蒋介石召集的全国学校代表谈话会,1月21日则在上海。这两年的相关时间段,胡适皆不在北平。1936年12月,《独立评论》已经停刊,若该信写于1937年1月18日,从礼节角度推断,余嘉锡不应于信中对停刊的《独立评论》有过多溢美。故此信当作于1933年或1934年。此信与上封信提及内容似有关系,推测为胡适于辅仁大学演讲后不久,余嘉锡致胡适的回信。故大致判定此信写于1934年1月18日。

信中提及“姚氏”,指清代学者姚际恒。从信中内容可见,余嘉锡对姚际恒的辨伪评价并不高。如评姚际恒之《古今伪书考》“为其聚敛无数之空言,毫无实据也”。又《四库提要辨证》曾云:“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引《馀论》(黄伯思《东观馀论》)之说……断章取义……殆几于不通文义……际恒《伪书考》负盛名,而其学实浅陋,大抵如此。”^②民国时期,姚际恒的著述受到了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推重。胡适认为“姚氏疑古最勇”^③,并曾说:“姚立方的遗著的发现,是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不单是因为姚氏的主张有自身的价值,并且这事可以表示近年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明显的倾向。这倾向是‘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④胡适对姚际恒推崇备至,而余嘉锡却认为姚际恒之《古今伪书考》“为其聚敛无数之空言,毫无实据也”。由此可见余胡二人在辨伪观念上存在较大分歧。

“黄氏”为黄云眉(1898-1977),浙江余姚人。1929年任职于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建国后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1932年出版《〈古今伪书考〉补正》

①注:此处“此致春安”四字,“致春”处原件有侵蚀,此依常理判断。

②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1009页。

③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3),第262页。

④胡适:《胡适全集》(第24卷),第130页。

一书,对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作辨伪、考订和补正工作。在《〈古今伪书考〉补正》“刘子新论”条下,黄云眉对余嘉锡曾有所批评:“又有谓‘六朝时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本传谓昼不学属文,盖指词赋而言,然不善属文者,未必不长于笔,’”(见《图书馆学季刊》二卷四期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此亦穿凿,六朝固有文笔之分,要亦施于评文对举之时,史家叙事,奚必舍通名而强分朱碧,转滋淆惑耶!”^①对于黄云眉的指责,余嘉锡则于此信中质之于胡适,认为:“鄙说未必非,黄说亦未必是也。”并批评黄氏之书“驳杂之处、穿凿之说所不能免,而其大弊在不通考证之方法”,“虽考索甚勤,要不过三四等文字耳”。

胡适与余嘉锡之间并非熟识的挚友,但从以上两封信可以看出,两人在学术问题上有过较深入的探讨,并相互将作品交对方求教。余、胡于两封信中所讨论的学问,皆与考据学有关,但近代立足于考据的学者,往往相互之间学术理念差别很大,胡适与余嘉锡之间,便是例证。胡适治学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引入杜威实验主义以活化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将清代学者注重考据的态度与西方的科学精神实现了沟通。但胡适并非专注于考据,而是通过从清代考据学中提炼出科学精神,以鼓吹其“科学主义”的文化主张,其根本目的仍是为了宣扬新文化。而余嘉锡治学则更多立足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思想上并不太认同五四以来的文化新潮。余、胡二人在治学观念及具体问题的考证上,都存在着很多分歧^②。通过对这两封信件的分析,可见胡适与陈垣、余嘉锡之间既有学术的联系和切磋,又在治学理念上存在张力,然互相尊重,彬彬有礼,其中透露出的细节,体现了当时学界的某些人情世态,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的认识。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①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正》,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2年,第319-320页。

^②参见牟润孙:《学兼汉宋的余季豫先生》,《海遗丛稿》(二编),中华书局,2009年。